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



1
1991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季刊

1991年第1期

(总第1期)

主 编:马大正
副主编:邢玉林
责任编辑:牛平汉

封面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冯光美

1991年7月出版

加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笔谈

- 边疆研究大有可为…………… 纪大椿(1)
一体与边疆史地研究…………… 张博泉(2)
要认真处理好几个关系…………… 周伟洲(4)
边疆研究三题…………… 杨建新(5)
边疆史地研究的求实与求效…………… 周清澍(6)
加强人才培养,繁荣边疆史地研究
…………… 戴可来(8)
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浅议…………… 吴丰培(9)
西藏研究四题…………… 多杰才旦(10)
开展中国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的一些设想
…………… 尤 中(11)

专 稿

- 论当前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几个问题
…………… 边 众(13)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 吕一燃(17)

学者论坛

-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 谭其骧(34)
论《禹贡》畿服制
——中国最古的边疆学说试探
…………… 刘 遂(43)
尉犁城、焉耆都城及焉耆镇城的方位
…………… 孟凡人(56)
《大理战书》与朱元璋的平滇国策…………… 杜玉亭(69)
南沙群岛史地问题的综合研究
…………… 林荣贵 李国强(78)
清代前期黑龙江下游地区的民族及行政管理
…………… 许淑明(89)
近代我国边疆民族中央管理机构的演变
…………… 赵云田(94)

学者介绍

- 近代新史学的开山者王国维…………… 邢玉林(104)
著名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张相文先生…………… 冀 棠(108)

文献研究

- 浅论《蒙古游牧记》…………… 蔡家艺(111)

CONTENTS

CONVERSATION BY WRITING ON STRENGTHENING STUDIES

OF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Ji Dachun (1)
.....	Zhang Boquan (2)
.....	Zhou Weizhou (4)
.....	Yang Jianxin (5)
.....	Zhou Qingshu (6)
.....	Dai Kelai (8)
.....	Wu Fengpei (9)
.....	Dorji Tseten (10)
.....	You Zhong (11)

SPECIAL CONTRIBUTION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Current Studies of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Bian Zhong (13)
A Review and Outlook of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Lü Yiran (17)

SCHOLARS' FORUM

China in Her History and China's Territory of the Past Dynasties	Tan Qixiang (34)
The "Jifu—zhi" (畿服制) in "Yu—gong" (《禹贡》) —An Initial Discussion of the Most Ancient Borderland Theory in China.....	Liu Di (43)
A Study of the Location of Karakum (尉犁), the Capital City of Karashahr (焉耆) and the Site of Town Karashahr (焉耆).....	Meng Fanren (56)
"Da—li zhan—shu" (《大理战书》) and Zhu Yuanzhang's State Policy to Conquer Yunnan	Du Yuting (69)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Problems of Nansha Islands	Lin Ronggui Li Guoqiang (78)
Administra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Heilongjiang River in Early Qing Dynasty	Xu Shuming (89)
Evolution of Central Administration of Borderland and Minoriti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Zhao Yuntian (94)

INTRODUCTION TO SCHOLARS

Wang Guowei — the Founder of New Historical Studies in Modern China	Xing Yulin (104)
Zhang Xiangwen — the Famous Geographer and Historian	Ji Tang (108)

LITERATURE STUDY

An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to "Meng—gu You—mu ji" (《蒙古游牧记》)	Cai Jiayi (111)
--	-----------------

· 加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笔谈 ·

边疆研究大有可为

纪 大 椿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以我国历史之悠久、幅员之辽阔、民族之众多、文化之灿烂,边疆研究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学术研究领域。边疆研究涉及许多学科,应该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通力合作。一些老一辈的专家在各自的研究范围内作出了许多成绩。解放后建立的一批研究机构、培养的一批包括各民族在内的中青年研究人员已经成长。他们奋战在各大中心城市,也奋战在边疆第一线。各方面的力量如果能够分工协作、取长补短,一定可以将我国的边疆史地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并向纵深发展。

要搞好边疆史地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去做。实事求是就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不要掺杂个人主观臆测,更不要随世局风云的变幻而摇摆扭曲。边疆史地研究牵涉到边疆地区的许多兄弟民族,牵涉到边界另一方的邻国,政治敏感性很强。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广泛占有资料、去伪存真,尊重历史事实、言之有据,对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经得起时代检验的科学阐述。

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遵循改革开放的思路,破除人为的学术禁区,敢于去探讨前人没有探讨过的新鲜课题,发前人之所未发,明前人之所未明。其实,有一些所谓学术禁区,与其说是人为的,莫如说是“己为的”,是自己给自己设置藩篱,或者是专写赶时髦的人云亦云的“大路货”,不愿做艰苦深入的探索性研究;或者回避矛盾、含糊其词,不敢涉足同现实有关的敏感问题,以免“惹麻烦”。这些都是不足取的。科学研究贵在唯实。只有反映历史真实的科学研究作品,才能对各级各地党政领导机构提供历史咨询,才能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要搞好边疆史地研究,必须以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作为出发点和归结点。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内陆边疆地区几乎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它们先后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有其历史形成的相互依存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联系。在阶级社会里,这些边疆地区往往发生过民族斗争、统一与分裂的斗争、外国的入侵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作为研究工作者,应当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指出它们的阶级斗争本质。一个热爱本民族的人必然也是一个尊重其它民族的人。热爱祖国同热爱民族应该很好地统一起来,不要被狭隘的民族感情遮住自己的双眼,模糊问题的性质。

前些年有人写文章,似乎是为了着意表现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史料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将一些跨境民族不加区分地都说成是中国的民族,他们所居住的地区也都说成是中国的疆域。这样一来,民族和国家的观念被混淆了,设官置守、征收赋税等表示国家领土归属的根本标志被否定了,历史上的中国领土疆域被夸大了。这样的文章影响了我国学术

界的声誉。背离了历史真实,爱国主义便起了质变,成为大国主义。

近两三年来,又有人出了几本坏书,扭曲史料,伪造历史,否认历代中央王朝在西北和漠北的地方行政建置,胡说长城是历史上中国的北方边界,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描绘成民族间相互侵占、相互攻伐的历史。这些坏书以写历史为名,鼓吹反动的泛突厥主义思想,鼓吹民族分裂主义思想。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边疆史地研究领域内的反映。它们的出版发行造成了一部分群众的思想混乱,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

这两种思想除了立场、观点上的区别之外,在思想方法上都是对确凿的历史记载采取漠视、掩饰,甚至杜撰、曲解等令人难以容忍的态度;在理论上都是没有处理好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否认国家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的变化和发展,从而推导出错误的论断。在学术界、在群众中消除这种不良影响,坚定地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无疑也是边疆史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要搞好边疆史地研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一些民族文字和外文史料需要译成汉文,一些重要的汉文史料也需要译成民族文字;国外一些研究成果要翻译介绍给国内研究人员;要出版一些国内外的罕见资料和档案资料;也希望以目前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基础,逐步扩建成边疆史地研究的资料中心和出版中心,等等,等等。

总之,我国的边疆研究是大有可为的。我愿尽绵薄之力,与先辈和同道努力奋斗,开创中国边疆研究的新局面!

一体与边疆史地研究

张 博 泉

(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历史记载中的一体,是指不同时期社会体制的系统构成,包括民族、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一体的构成不是一个永久不变的模式,由家大夫、国诸侯、君天下的“天下国家一体”到家编户、国郡县、君天下的“天下国家一体”,都属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天下一体”。后来在四裔地区出现中国型的地方民族政权和王朝,以中原为中国的格局被不分中外的都是中国的格局所代替,进而统一为一个全国的“中华一体”的新格局。“中华一体”是华夷、中外统一的中国,在统一中国内分中央、内地和边疆。边疆史地的研究离不开这个发展变化,同样的要用一体的思想进行研究,既要掌握其“天下国家一体”时的四裔与中国的关系,也要掌握“中华一体”时的边疆与内地的关系,这是由“春秋大一统”的观念向“中国一统”的新观念的推移中发生的。我认为用一体的思想研究边疆史地,就是从整体上把握多元的民族与区域的格局,有系统、有层次的进行研究。一体是多元的一体,多元也是一体的多元,一体是研究边疆史地的最基本的条件和依据。

从一体的区域划分看,在历史上可分为内中环、内外环和外外环三个不同的层次。内中环包括京畿和四方诸侯国或郡县的地区,即所谓中国,而京畿则是中国内的中国。内外

环即四方诸侯国或中原郡县以外的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四裔地区,由中国、四裔构成“天下国家一体”。外外环指一体中的四裔以外的地区,即邻国。边疆史地的研究,重点是研究历史上的内外环地区的民族和地理,并通过它来研究内外环的内向联系和发展,以及外向联系和发展。边疆史地是一体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一体内的联系是由同服不同制的分华夷、分中外的阶段发展。对于边疆史地的研究应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边疆局部地区的史地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方面的史地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在对第一、二层次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整体的系统的研究。从整体上研究它是怎样的变夷从夏、变外为内,由“天下一体”发展为“中华一体”的;同时也要研究其社会的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是怎样的由不同制发展为同制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同制就是齐一,连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的经济等的类型都不存在了。在统一的全国的“中华一体”中,仍有民族、地区和经济类型等的不同。

要研究在一体中的华夷、中外的不同时期所发生的关系和性质的新变化,应对“华夷正闰之辨”持批判的态度。“春秋大一统”的一体观,是“天下国家”三位一体的分华夷、分中外的一体观,视四裔的民族为“禽兽”,视四裔地区为“外”,“内诸夏而外夷狄”,“贵中华,贱夷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把这种观念看成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后来变了,夷狄入居中国,并在中国建立封建割据的政权和北朝,成为中国的民族和政权。及至不分内外的中国范围内的多政权和多王朝出现时,“中国一统”的观念便逐渐代替了“春秋大一统”的观念。华夏在其初主要是指在中原的华夏族和汉族,后来中国、中华的观念上升到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上,中国、中华不仅指汉族,也指在中原的其他族,后来又发展为包括一体内的中外的所有民族在内。各族是发展的进步的,通过慕华、仿华、从华而成为新的华夏。各民族在中原或边境地区都找到了在发展本族的基础之上与汉族同用中国制度,或把中国制度与本族制度结合,或接受其影响和制约,在华夏的共同文脉、道统和政统上结成一体,不分民族、不分中外,皆为中国、华夏。在同为中国、华夏这个大的前提下,中国、华夏,已成为高于各族之上共同称谓,汉族是中国、华夏,其他各民族也同样是中国、华夏;中原是中国、华夏,边疆地区也同样是中国、华夏;汉族的文化是中国、华夏,具有少数民族和地方特点的文化也同样是中国、华夏,由各民族、各地区和文化结成一个中国、华夏,华夏已不再是单一的汉族、中原和中原文化的称谓。

在历史的发展中,各民族与汉族融合,也就是汉化为汉族是存在的,但汉族也同样与少数民族融合,影响与融合是互相的。但由于华夏已成为高于各族的称谓时,已不再是单纯的汉化问题,而是由于各民族的自身的发展以及地位和自树能力的增强,他们已寻求到在发展本族的过程中,与汉族并存,变夷为夏,在同样的以华夏文明为基础创本族的文字,设本族文字的学校和科学,变本族的制度为华夏制度,这是华化而不是汉化。从历史的发展趋势看,不是走各族都融合于汉族的道路,而是走各族同为华夏的道路。从“中华一体”的观点研究边疆史地,不仅研究汉化,民族间的互相融合,而更重要的是研究各族是如何华化为中华民族一员的。他们在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过程中,对整个中华的发展都不同程度的做出了贡献。以“中华一体”的思想研究历史上的民族一体,国家一体,是研究边疆史地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要认真处理好几个关系

周 伟 洲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主任 教授)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各个时代的研究无论在观点、方法,或是侧重点方面,都有所不同。在本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今天,国际上许多国家和民族动荡不安;我国正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边疆、民族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在这一新的形势之下,如何开展我国的边疆史地研究呢?这是我们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在九十年代的今天,开展我国边疆史地研究应处理好下列几种关系:

(一)继承与发展 首先应继承我国历史上边疆史地研究的优良传统。如边疆史地研究与现实紧密结合的传统,特别是应继承清代以来,我国学界有识之士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侵吞我国边疆,造成我国边疆危机,而奋起研究边疆史地,以唤醒国人,共御外侮的优良传统。又如研究中扎实严谨、考据精当等一些值得继承和借鉴的治学方法,实地调查与文献、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特点等等。但是,在今天,我们还不能停留在继承和发扬我国历史上边疆史地研究的优良传统上,还应引进最新的科学方法。边疆史地研究如今已越来越向多学科、综合性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民族观作指导,引进并应用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的方法和最新的成果,采取最新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边疆史地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二)提高与普及 我国边疆史地研究在观点、理论上应冲破过去存在的旧的框架,特别是那种贴标签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真正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研究我国边疆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出现一批带有综合性的、高质量的专门著作,将我国边疆史地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应顾及到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需要,出版一批通俗、生动的关于边疆史地的小丛书之类的读物。提高与普及是相互促进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边疆史地研究充满活力,更能发挥其为现实服务的作用。

(三)学术与现实 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边疆民族地区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加之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一些边疆地区出现了一股分裂主义的暗流。少数人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借写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扭曲史实,宣扬分裂主义,挑拨民族团结,破坏祖国统一。事实上,从古到今,并不存在什么“纯学术”的论著,学术总是与现实紧密连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人应当首先解答我国边疆民族出现的一系列新的问题,并与国内形形色色妄图分裂我国边疆的伪科学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肃清他们散布的流毒,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贡献。

(四)困难与前景 目前,我国开展边疆史地研究存在着许多困难。比如研究机构经费缺乏,设备陈旧,资料不全,信息不灵;研究成果很难得到发表的机会,出版困难;到边疆实地调查更是困难重重;研究人员严重老化,后继乏人等等。然而,社会的进步,现实的需要;边疆史地研究领域日益宽广,越来越具有了新的活力;也更加引起边疆各地及全国各

级领导的注意,前景是乐观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刊物的正式创刊,就是一个明证。只要我们迎着各种困难,坚韧不拔地向前迈进,相信我国的边疆史地研究必将在我国社会科学的花园中独树一帜,取得应有的地位。

边疆研究三题

杨建新

(兰州大学历史系主任 教授)

我国边疆史地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了进一步发展这门学科,我想就下面一些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关于中国历史上边疆问题的特点和研究重点。

中国历史上的边疆问题,是边疆史地研究的核心和基本内容,弄清中国历史上边疆问题的特点,对我们确定边疆史地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很有帮助的。中国历史上边疆问题的特点,我认为主要是:1、长期以来,历史上中国边疆的巩固、动乱、变化、兴衰等,无不与少数民族的活动和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有关,因此历史上少数民族问题,特别是民族关系问题,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一个基本内容。2、中国传统的史学体系以王朝为本位,特别是以汉族王朝或占据中原地区的王朝为本位,而且各王朝范围的变化十分频繁,所以历史上所说边疆问题,代有不同。我们的研究当然只能以现代中国的疆域为基础和立足点,但也不能无视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疆域和边疆的变化情况。因此,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对象,当然主要是中国边疆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即现代中国的边疆。但是,各王朝,包括中国分裂成几个王朝(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政权)时,各王朝的边疆,也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和范围。3、历史上各王朝统治者对边疆问题的处理,其基本角度虽都以统治、压迫、歧视为出发点,但其形式、措施却多种多样,如羁縻府州、军政分治、移民屯边、朝贡赏赐,或因俗而治,或纳入郡县,或驻军,或遥控等等。但不论哪种形式,都是其主权的一种标志。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行政管辖时,就不能完全用现代行政管辖的概念和国际法原则来解释历史上的中国边疆和边界,必须以当时认为是表示主权的各种措施为标准,研究历史上中国边疆和边界的范围。4、中国古代的边疆问题,基本上,或大部分时间内,是国内民族问题。但自十八世纪中叶起,随着世界国际政治秩序的进一步健全,特别是随着人们对国家主权、国家边疆、边界认识的提高和确定边界的科学知识、科学手段的发展和提高,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国家的边界都有了具体的确认;在这个时期,我国清朝疆域也发展到了一个更加稳定、明确的时期,中国的边界,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也被具体的确定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这时期也进入了完全的近代主权国家的行列。此后在中国的边疆问题中,中外关系的成份,日益增多。并且随着清朝政府的腐败以及内地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尖锐,清朝政府放松了边疆建设和边界的防卫,不少边疆地区,逐渐为外国势力所侵吞。到1840年以后,这种情况更发展成为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大量侵吞中国边疆,使中国边疆

发展史,转变成成为外国列强侵吞中国领土的丧地史。我认为这是我国边疆历史发展中实际存在的两个阶段,而且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我们在研究中,在对不同时期边疆问题的表述中,都应加以区别,给予必要的注意。

中国历史上的边疆问题多种多样,而且许多问题已有了比较详尽的研究和充分的阐述。在当前情况下,我认为应重点研究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祖国,特别是要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在开发、保卫边疆中的历史作用和功绩,找出边疆与中原地区或长久不分,或分而又合,或分分合合而最终仍能组成统一版图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在联系和原因。

二、关于继承边疆史地研究的优良传统。

历史上我国边疆史地研究和记述中最明显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与解决现实的边疆问题密切相关。这从现在保留下来的有关边疆史地的记载和著述中,可以得到明确的说明。这种与现实问题相联系的学风,是我们今天边疆史地研究者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当前我国多数边疆地区主要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如何赶上其他地区的问题,二是如何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分裂活动问题。我国边疆史地研究应为发展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出谋献策,为提高边疆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维护各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自觉性,批驳、揭穿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分裂活动而贡献力量。

三、关于创立边疆学的理论体系

应把创立边疆学基本理论的任务,逐步提上日程。边疆学是一门综合、交叉、边缘学科,边疆史地研究,是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门学科及其分支若要得到长足发展并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必须有自己的理论系统。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结合我国以及世界各国边疆问题的实际,对中国边疆问题进行理论性探讨,进而创立边疆学理论体系,是十分必要的。边疆学的理论体系,应该包括关于它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对象、范围、目的的理论性概括;关于认识和确定历史上边疆、边界的法律的、历史的、社会的、自然的依据的一般性理论;关于边界、边疆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原理;关于边疆与内地、边疆与邻国关系的一般性原理;关于强权、民族自觉和社会经济内在联系等因素在边疆形成、发展和变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关于边疆居民、民族的权利、义务问题的一般原理;关于跨国民族的法律地位、民族学特征等等,都应是边疆学理论的重要问题。理论性的探讨,必将使边疆研究进一步深化,进而形成边疆学所特有的体系和概念。

边疆史地研究的求实与求效

周 清 澍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教授)

我在边疆地区工作三十余年,试图结合内蒙古的实际情况,想就发挥边疆史地研究的爱国主义教育和促进国内民族团结的作用问题发表一些初浅的体会。

谈到我国的北方疆界,就会使人想到万里长城。长城与古代的疆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边疆史中一个重要课题。过去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中国,借长城作了不少文章,胡说中国自古是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不是中国的领土,长城以外的汉人只是晚近才从内地移殖过去等等。有些同志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愿望,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否认长城曾是古代中国有些封建王朝的边界,而且否认它是为防御外族入侵而建,竟说长城是民族团结的纽带。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长城本身就有一部丰富的历史,不是一两句话可说清楚的。更不能到八达岭旅游一次,就以为是见到了两千多年前秦始皇修建的长城,从而得出千年古都北京离边界线只有几十公里的结论。

由此可见,为了批驳帝国主义的谰言和消除某些人的糊涂观念,应该普及些边疆史和长城史的知识,使人们知道:(一)、长城并非地图上惟一的一条线。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长城是明代的长城,当时八达岭外,张家口北还有一道长城。因此不能一见长城就说它是边界。(二)、从战国时燕、赵、秦到秦朝大统一,历经汉、北魏、北齐、隋都修筑过长城,金代修过界壕,遗迹遍布内蒙古各地,或南或北,最北有的已延伸到今天的境外地区。所以,长城并非几千年不变的。如果分别就各个王朝讨论,当时的长城的确是保护其有效统治区的屏障,由此可以推测它的边界范围。(三)、唐、元、清朝,长城南北皆处在统一的国家之中,这时的长城就失去军事防御工程的意义。因此,为了澄清北方边疆长城问题上理解的混乱,开展对历代长城的研究和实地调查就很有必要。

在边界沿革史研究中还有一种倾向,有的人为了强调祖国的统一,总愿意把古代的边界画得越远越好,进而否认少数民族曾建立过独立国家,只能称地方政权,甚至连辽、金、夏王朝也不能称为国。有朝贡关系则称为统一,发生对抗则简单斥之为分裂。我认为这是背离历史事实的,只能激起少数民族的反感,而不利于民族团结。由于我国各民族先实现了本民族的统一,才可能形成今天多民族国家的大统一。因此,在边疆史地研究中,不仅要承认边疆民族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创造,也应承认他们在政治上促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贡献。

开展边疆开发史的研究可以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如内蒙古地区人类的活动就有悠久的历史。在呼和浩特市郊,已发现了五十万年前与北京猿人同时的旧石器文化遗迹。旧石器晚期、中石器时期的遗迹也多有发现。新石器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几乎遍及内蒙古各个地区。战国以后,文献史料就具体地记载着北方民族的活动,其中较著名的有: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室韦、党项、契丹等。同时,中原的燕、赵、秦、汉、北朝、隋、唐、辽、金、元及明初皆曾在今内蒙古设置过地方政府,有华夏人在此生活。并非从清朝才有汉人移民。我们反对某些西方学者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但也不能否定北方民族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或者一概视为黄帝的子孙、“夏后氏之苗裔”,或者将边疆各族经济和文化的成就看成是中原文明向边疆的扩散,这显然背离了历史事实。上述考古发现证明,内蒙古的人类文明史是和中原同时开始的。历史记载也证明,绝大多数年代里都同时有北方民族和汉族在内蒙古地区居住和生活。这些事实生动地揭示了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内蒙古的历史。

总之,我认为要通过阐述边疆的历史,发挥教育人民的作用,就应该加强边疆史地研究中每个课题的深入研究,用具体的史实和科学的结论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样才能起到真正有效的教育作用。由于有关边疆的记载缺乏,民族、语言和文字的不同,实地调查的困

难等等,更增加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既需要各界有识之士的倡导,更需要老中青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加强人才培养,繁荣边疆史地研究

戴 可 来

(郑州大学历史系主任 教授)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与周围邻国有的陆路相接,边界线绵长;有的隔海相望,水域相连。为了维护与周边国家的友好睦邻关系,为了维护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和领海,我们必须大力开展边疆史地和边界问题的研究。现愿略陈培养边界问题研究人才的管见,向同志们求教。

边界问题研究涉及历史、地理、民族、国际法等许多学科,还要求研究者通晓多种外文,并有较强的政策观念。这些都不是一般大学生所能达到的,必须有专门的训练和培养。目前,我国的边界问题研究者,大多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有的是学历史出身或是学民族学的、国际法的,知识结构不健全,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实践和摸索,才能适应工作要求,做出一定的研究成果。这种成才道路较为缓慢,难于满足现实斗争的急需。从另一方面看,在我国边界研究中已涌出一批优秀的专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把这些专门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必将促进年青研究工作者的迅速成长。

由于边界问题研究难度大、政策性强,出成果不易,公开发表更难,因而影响了评职晋级,使不少同志把它视为“禁区”,不愿触及,青年人则更是望而却步。这样就形成我国边界问题研究力量不足和后继乏人的严重局面。若不加紧培养人才,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研究水平下降甚至难以为继的状况。

根据上述边界研究本身的特点以及研究力量薄弱的现状,深感必须刻不容缓地加强培养人才的工作。为此,我们建议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主,设立边界问题的硕士生点,争取硕士授予权,培养硕士研究生,为边界研究输入新鲜血液。在教学力量安排上,可以聘请“中心”以外有关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任课;同时,在课程设置上,应注重实地考察,三年学习中要抽出不少于半年的时间到边疆地区实习。

在加紧培养人才的同时,建议采取措施,调动现有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例如,从边界研究的现实情况出发,要求有关部门认可内部发表的研究成果作为评职晋级的依据,解除研究者的后顾之忧;再如,设立边疆史地研究基金,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并开展评奖活动,奖励优秀论著等等。

我们相信,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调动起现存边疆史地研究者的积极性,加强人才培养,我国边疆史地和边界问题研究,就一定会出更多的成果,出现繁荣的局面。

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浅议

吴 丰 培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

建国以来,对于边疆、民族的研究有极大的发展,成立了许多研究机构,培养了大批从事此项工作的专业人员,尤以1958年中央下达任务,责成人大民委组织高校师生调查队伍,分赴各民族地区结合地方政府所派遣人员共同作了大量的、全面调查。编写了三套丛书,确是空前的盛举,不仅抢救了许多濒临遗失的文献、古物、古迹和风俗,又培养了大批研究民族的专业和本民族干部,在此学术领域里开花结果、方兴未艾。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创刊之际,对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今后工作略述浅见,以示献曝之忱。

一、广泛收集古今中外图书资料

由于中心成立较晚,经费较少,对于图书资料,尚感不足,必须大量充实,方能开展工作,似须图与书并举、古今并举、中外并举,专业书与参考书并举,仅此四项,非短时人为所能完成,则应按年制定计划、分期从各方面入手。(1)现在各民族地区出版地区之书较多,则可自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甘肃、西藏、广西、云南以及东北各地将现已出版者订购一批,自后请其源源寄来,再于社科院范围内设法购得内部出版物,推广到各学术单位征购以及与港台、国外研究单位开展交换。向市内先购一批目录、索引、字书、辞书、丛刊及各种必备参考书。(2)向各大图书馆请求复制或缩微,如北京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将他们已经收到复制的书中,选出需要部分,用胶片缩微,虽然价钱略高,也是必须做的。再北图现藏有美国档案,其中部分资料不乏边疆民族资料,希望选印一批,加以汉译。又闻近来已将英国档案中有关中英印藏关系资料复印回来,可以设法订购胶卷。(3)向私人购入旧籍,如已故北大教授齐思和、陈庆华、民院教授贾敬颜、民研所所长翁独健等都存大批遗书,内多难得之书,如能设法购入,优与书价,则大大丰富藏书,并成立图书委员会,拟定计划,下设专业人员从事采购,以微机处理编目,若有几年,定有成效。

二、从事专门研究及实地调查

世界各国对于实地调查,极为重视,我国也正由科研单位进行各种调查,则此项工作,似应提前进行。如前人陶葆廉的《辛卯侍行记》就携带几车书籍,随时引古证今,成为名著。如今科技发达,更应携带设备,分批进行,不仅可以写出高质量论文,并可绘制精细地图,更会得到许多副产品。

三、扩大研究范围

现在边疆研究的范围,偏重于陆地,对于海疆尚感不足,例如海南的研究起步不久,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尚未展开,是否加以提倡并与当地研究者结合,共同出版古籍,以满足研究需要。再如我国境内有许多跨国民族,如西北的哈萨克、东北的朝鲜族。以往重点在于国内,似也应研究国外。同时对于这些邻国,也应研究和了解,则“知彼知己”,更为全面。

四、扩大史地资料的刊行

今后似应加强海疆古籍整理,并将民族文字及国外文字选其珍品,译成汉文,并将可以公开的汉文资料,译成外文或民族文字,更使沟通。

五、培养接班人

中心工作,成绩突出,主要由于精兵简政,人自为战。今后扩大范围,更需人力,则培养接班人,刻不容缓,但无需开训练班或脱产学习。可在工作中有意识的加以培养。如大量收集图书,使青年制定阅读计划,工作中进行编辑、收集、翻译、调查、绘制、利用现代微机 etc 等提高水平。要使每个青年必须掌握二门外语,同时对古汉语亦应督促自习,因古汉语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留下无数宝贵文献,而白话文仅不及百年,与古籍数量尚存差别,如果阅读古籍尚有困难;竟有“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者,则如何古为今用。故希望注意及此,使接班人成为学贯中外古今的多面手。如能在本单位或社会上中外知名,对此专业有研究者,请作经验报告,每年一二次,并在本组织内展开各门研究的报告会,每季一二次,其成绩可作为考评的标准项目之一,如此自学、互学,似可加快培养的过程。

拉杂写出,未必中肯,姑枉言之,以求指正。

西藏研究四题

多杰才旦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 研究员)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是边疆史地研究工作的重要对象之一。分裂与反分裂的复杂斗争形势,使得搞好对西藏的研究更显意义重大。

西藏地方自元代以来正式列入中国版图,本无可非议。制造“西藏独立”,是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挖空心思策划的战略阴谋,是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罪恶步骤之一。这一点,从现存的大量史证(包括西方所谓传教士、探险家、外交官、商务人员的“自供状”)中可以再清楚不过地得到反映。然而,时至今日,国际上还有许多人士不了解历史真相,流亡国外的分裂集团在帝国主义的怂恿下有恃无恐地继续从事着分裂活动,国内也有一些人对此有这样或那样的模糊认识。由此看来,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不仅要揭露帝国主义势力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企图破坏我国统一的种种阴谋,而且要在我国历史的大前提下揭示西藏近代历史上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复杂背景。更要以凿凿可信的史证说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间长久的历史关系。西藏地方的历史有个明显的规律:它的命运与祖国的盛衰密切维系。它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军事及法律制度,以及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与祖国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研究西藏地方历史,不论是政治史还是经济史、制度史、交通史、民族关系史等等,一定要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着眼。对于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间广泛而深入的历史联系,视而不见或者任意夸大都是有害的,问题的关键是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对于西藏地方的早期历史及以后各时期的社会状况,汉文记载不是很多或不甚详备,这就要求治史的同志到藏文文献中去发掘,还要到蒙文、满文、英文、俄文、甚至梵文、拉丁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的历史文献中去发掘。例如对丝绸之路吐蕃道的研究,以往重视得不够,以为青藏高原腹地高寒荒远,行者畏之,绕道而行理所当然,而我们在初步研究中,就分别从公元10世纪前的汉文、藏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的史料中查到了吐蕃道的四条路线:一条是大家所熟知的道宣所记的路线,即长安—河源—吐蕃—尼泊尔—印度;另一条是中亚—吐蕃—南亚间的通商大道;第三条是沙州(敦煌)—吐蕃—尼泊尔—印度;第四条是经益州(成都)穿行吐蕃东部地区至南诏,再到今缅甸、印度的大道。进一步研究可知,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特点,丝路吐蕃道的具体路段往往有一定的随意性,其各条干支线也象丝路干道区域那样呈网络状分布,而不象交通发达地区那样有始终固定的路线。可见这些记载对于研究中西交通史,对于深入研究丝绸之路,都是十分宝贵的。由此不难看出,有关文种的史料发掘是大有潜力的。

研究历代的治藏方略非常重要。分析其利弊,权衡其得失,知古鉴今,择善而从,对于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来指导西藏的建设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1986年,我接待达赖喇嘛的一个代表时,他一见面就问我:为什么我们藏族不能建立一个包括甘青川滇藏的大自治区?我向他讲了历史的、现实的原因。设立一个大的藏族自治区,实际上对藏族长远的根本利益不利,地区是那样的大,加上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没办法管理,没办法领导,所以过去历代中央王朝施政时也得有个地理界线。我当了三年自治区主席,阿里、昌都两个地区尚且照顾不到,如果搞所谓大自治区,又将会怎么样呢?他这才若有所思。元、明、清如何对西藏施政都很值得深入研究。每个朝代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根据自己的战略制定一整套施政方针的。其中既有糟粕部分,也有顺情合理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研究、鉴别。

对于近代历史上的西藏,除了研究“麦克马洪线”的问题、阿克赛钦的问题等等,还应 对藏族人民抵御外侮、保卫祖国疆土的英勇业绩予以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这些都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搞好这方面的研究和宣传,对于教育下一代,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爱国主义观念,对于促进民族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都有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开展中国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的一些设想

尤 中

(云南大学档案系教授)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自近代兴起,迄今已一个多世纪;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近年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十分迅速。这里我们谈谈对今后中国西南边疆史地研究如何开展的一些想法。

中国边界线漫长,边疆地区非常辽阔,不同的地区各有特点,例如,西南与东北、北方、西北等相比较,在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都具有一些地区性的差别,因此,应当大力开展地区的边疆史地研究。各地区的研究者发挥其熟悉本地区情况的优势,把这项工作做好,可以为全面系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多创造一些条件。另一方面,地区的划分又不宜过细,例如,在西南,如果云南、广西各自只考虑本省、区,则西南边疆变迁等课题就难以全面地阐述,所以在研究工作中应从大西南的角度考虑问题,相关省、区的研究者也应加强联系与交流。

西南边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许多少数民族还跨国境而居,据统计,分布在我国西南与邻国的跨境民族和未明确民族地位的群体共有壮、傣、布依、藏、彝、苗、瑶、景颇、拉祜、佤、德昂等近20个。有的民族原先不是跨境民族,后来随着民族的迁移、国境的变动而成了跨境民族;有的民族居住西南边疆历史较久,在边疆地区留下了许多用本民族语言命名的地名,其中一些一直保留到现代;边疆各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生动的边疆地区开发史。所有这些都提示我们,边疆的发展变迁,与边疆各民族人民的历史息息相关,开展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离不开对边疆各民族尤其是跨境民族的研究。将西南边疆史地研究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相结合,是我们多年来努力的方向,也是今后继续努力的目标。

历代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施政方略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现在我们有民族政策,历史上封建王朝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时,也是有一套章法的。从汉代的羁縻政策到元、明、清的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封建王朝边疆施政方略发展的线索是清楚的。在边疆地区,王朝的施政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边疆民族的向背、领土的得失,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总结,对我们今天的边疆工作、民族工作是有借鉴意义的。

西南边疆对外通道研究是另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早在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就存在着由巴蜀、夜郎经滇,西达缅、印,南到交趾和由苍梧、桂林经合浦西抵交趾的陆上通道,以及由合浦联系东南亚等地的海上通道。往后,这些通道一直见于记载,而且随着边疆开发的深入,又逐渐有更多的通道被更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些通道往往沿袭到现代。对它们的发展和变迁展开研究,可以为西南边疆的交通建设和对外开放提供参考。

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的课题还很多,例如汉族人口向西南边疆迁移史、西南边疆开发史、近代西南边界形成史、西南边疆与周边邻国关系史等,都是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值得我们下功夫去深入研究。

研究边疆史地涉及到一个对历代疆界怎样看待的问题。边疆、边界,如同任何事物一样,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并非自古不变、始终如一。尊重历史,如实地对各个时期的边疆、边界加以说明,是科学工作者应取的科学的态度,也只有这种准确的、科学的研究成果,才对我国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时具有真正的参考价值。

目前我国的边疆史地研究应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与一些邻国的研究状况相比尤其如此。我国是一个拥有漫长陆疆和海疆的国家,又是一个历史悠久、历史资料十分丰富的国家,我国的边疆史地研究应该成为一门相当发达的学科,向这个目标努力,是新中国边疆史地工作者的责任,让我们以此共勉!

本文由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讲师苏建灵执笔本栏编辑牛平汉

· 专 稿 ·

论当前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几个问题

边 众

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应弄清楚什么是“边疆”。我们认为,“边疆”首先是地理概念,与一个国家的国界线有着密切的关系。简言之,“边疆”是指直接与国界相关联的地区。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不仅可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在提供稳定边疆、建设边疆的科学依据和维护领土完整的历史经验等方面,也具有不可轻视的作用。

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过去由于历史和民族等因素,学者们多注意陆疆史地研究,而忽视了海疆史地研究,这种研究上的不平衡,近年来虽有改善,但并未根本扭转,其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领域十分丰富,它不仅与历史学科中的中国通史、断代史密不可分,同时涉及民族史、地方史、中外关系史等专门史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不仅要研究历代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同时也要研究当地的社会、民族、地理、宗教、对外关系等方面。因此,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实际上既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又是一门与众多学科相关的交叉学科。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自身研究的主要对象。由于边疆和边界密切相关,因而中国古代疆域沿革史和近代边界变迁史,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占有突出的位置。

现就当前如何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略作论述。

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我们认为近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应着重研究下述三个方面: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关系;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中国边疆研究史。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的关系,其研究内涵十分丰富,尤其是其中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是一个带全局性的研究课题。它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传统项目,古今学者对此倾注了心血。中国历史上各代、各朝无不存在边疆问题,统治者相继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边疆政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经唐、元、明、清诸强大统一王朝的补充、完善,渐成体系,其完整和丰富为他国历史所罕见。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不仅与彼朝彼代的存亡兴衰休戚相关,而且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及至今日,认真总结和评估古代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仍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内涵十分丰富,研究层面很多,其中重要者诸如:

1. 历代边疆政策的综合研究,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政权的边疆政策研究;
2. 边疆政策中一些带有共性问题的专题研究,主要包括边疆行政建置、边疆经济开发、边疆文化与宗教等;
3. 边疆政策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民族政策和近代边界政策研究;
4. 边疆政策制定的重要前提之一的传统治边思想研究;
5. 不同国别的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边疆政策的比较研究;

6. 边疆政策所涉及的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文化诸领域研究;

7. 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的研究与考证。

可见,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今天我们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前提出发,又提出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中国历代边疆管辖制度等研究课题,新的研究课题提出,以及这些课题周缘的扩展,必将不断拓宽研究者的视野。

开展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的研究更是刻不容缓。40余年来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地方史等研究领域的丰硕成果及研究已达到的广度与深度,为深化近代边界变迁史研究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当前,除应积极编撰多卷本的《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外,还应开展多界面、多层次的专题研究,诸如地区性的边界变迁史;近代不平等条约与边界问题;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与中外诸方对策;近代边疆危机与边疆社会变化,等等。总之,这一领域关系到近30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与有关各国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民族等方方面面,广阔的研究天地足以供学者上下求索。

从史学史角度系统收集与评述本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成果,是一件值得下大力气的工作。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闭锁的清帝国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西北、东北、西南边疆相继出现严重危机,以魏源、何秋涛、夏燮、梁廷楠、徐继畲、曹廷杰等为代表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学者为抵御外侮,巩固边防,发愤潜心于边疆史地研究,他们的著作至今仍不失为警世之作,这一研究发展的势头至清末而不衰,从而促进了历史沿革地理学的发展,出现了丁谦、杨守敬等毕生致力于斯的学者,1911年出版的杨守敬、熊会贞合作编著的《历代舆地图》,是一部我国地图绘制史上空前巨著。第二次是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一批接受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学者,痛心于深重的民族危机,希冀通过边疆史地研究,激发国人之爱国热诚,其成果令人瞩目。30年代在中国史坛上独树一帜的禹贡学会,在顾颉刚的大力组织和推动下,致力于边疆史地研究,出版了《禹贡》半月刊,编印了《禹贡学会丛刊》。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边疆史地论著,更重要的在于造就了一代边疆史地学者。但是在人们向老一辈学者求访中,当我们细细翻检报刊论著目录时,发现以上所述仅仅是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一个侧面(如果能谈得上是重要的一个侧面的话)。要了解20年代至40年代边疆史地研究全貌,还有待进一步做细致的工作,当时活跃于这领域的学人、有影响的学术团体、受人注意的刊物,犹如群星灿烂。可以说在相对集中时间里,出现了这么一批研究群体的本身,就是发展的明显标志。只是这些学人、团体和刊物,近40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被人们遗忘了,只要我们拂去边疆史地研究果实上的历史尘埃,它们仍能被我们今日研究所借鉴。追寻20年代至40年代研究发展的轨迹的工作很多。在宏观上,我们可以总体评述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成就与不足;在微观上,可研究学者、学术团体等个体的学术活动的成败得失。对研究个体、研究群体的评述尤应重视,因为从个体到群体的过渡和群体的形成是学科发展的标志和保证。就个体而言,应化大力气总结每个学人的学术成就与不足,调查20年代至40年代边疆史地学工作者的学术生涯,从中获得生动和丰富的感性认识,使我们对学人的评述更完整、更富立体感。现在,我们正面临第三个研究的发展时期,这个发展时期的到来,可以说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40余